

13

报告文学与创作谈卷



木青

WENJI

文集

MUQING

春风文艺出版社



木青 WENJI
MUQING 文集

春风文艺出版社

目 录

报告文学

作家宿舍〇号	3
一篇小说和一千封求救信	19
蛇岛考察	30
她与一个神圣领域	36
他们走向世界	52
行一路注目礼	70
场记的追求	83
“铁阀人”的情感世界	86
另一种强者	99
沈字号垦荒牛	107
转化“魔瓶”	116
春天的追求者	130
飞翔吧，歌声！	145
探寻“隐身”的（V）	152
开拓民族声乐沃土的人	170
杂交鲫鱼大王	174
大画家赵华胜	181
不凡与平凡	191

我认识的书法家祁庆泰	197
画家白燕君和他的神鸡	202
画家卢志学印象	208
春的生机，山的凝重	214
我的绿色沈阳	221

创作谈

我写《哈瓦那的孩子》前后	235
《远方的星》后记	247
散文集《这块天地里的精灵》后记	252
诗集《爱之歌》后记	254
我写《五爱街》	256
我写《重工街柔情》	261
我写长篇《永裕街轶事》	266
我写《匪患世界》	269
我写歌曲《红领巾向着太阳走》	272
《旋转的舞步》后记	275
《三叶草》后记	279
我写《幼林里的墓碑》	282
《木青短篇小说选》后记	286
《木青诗选》前言	290
《女人男人商人》后记	294
我爱儿童文学	297
关于创作的通信	300
认同与追求	304
长篇《钟情》书简	309
我的艺术渴求	315
关于文学与文学现象的通信	319

中国二十一世纪文学之我见	322
再说二十一世纪文学的进化	324
我的现实生活与现实主义	327
关于“不写现实”与“纪实非小说”的质疑	332
答“世界名人中心”问	339
被压出来的小说	347
我钟情散文	351
儿童诗小议	353
歌词作者懂点“平仄”好	355
语言的神力与魅力	358
大潮前的思索	362
文坛“东北军”	366
东北文学与我	375
给初学写作者	380
关于办报的通讯	381
激情写作	384
《我自己的世界》自序	387
乡情：文学创作的根	390
追求的足迹	395
这是一个真实而幻想的天地	402
生活的有条件和无条件	407
文学、童年与生活	410
形成自己	413
创作谈二题	416
我钟爱的星座	419
高原的歌者	423
给下一代讲周总理的故事	428

重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引起的联想	431
博者著文精且辟	437
独具魅力的《梦土》	440
感悟生命	444
创作足以代表民族先进水平的文学作品	447
我说“行为艺术”	449
我愿当振兴东北的鼓手	452
《木青文集》后记	456
木青著作要目及获奖情况	458

报告文学

作家宿舍○号

刚粉碎“四人帮”时，我仍处于困境，苦苦地挣扎，可是有一天，我突然接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王鸿谟同志的电报：

大作《不许收获的秋天》拟采用，请速来定稿。

犹如久旱逢甘霖，我欢喜若狂，颤抖地拿着电报自语地说：“王鸿谟，大恩人！王鸿谟，大恩人！”

于是，我立即收拾行装，风风火火地来到北京。

一下车我就到了“人文”社，在忍受了两个半小时的冷与饿后，编辑们才陆续上班。

一位瘦高个儿、大眼睛、风纪扣严整，颇有几分像“五四”时期大学生味道的编辑出现了。看门女同志立刻高兴地扬手喊道：“李景峰，你们组的作者来了，那！”说着，指指我。

我忙自我介绍：“我叫木青，从……”

没等我说完，李景峰已“啊”地连笑带摇我手：“沈阳的木青同志，我们正等你呢！你来前怎么也不打个电报？我们好去接你！”我鼻子眼睛酸了，只是强忍着没落泪，“嗯嗯

哦哦”地打“葫芦语”，心里却说：“我这已是由鬼变成人，一步登天了，还用接吗？”

李景峰一把拎起我的大包：“走，我先领你到食堂吃饭去，然后去宿舍。”我赶紧抢拎包，他不容商量地推开我胳膊，抬腿便走。这是个真诚待人的编辑！

安顿我吃上饭，老李又脚下生风地走了。没过几分钟，领来位圆脸宽肩的人，这人穿着与表情朴实、憨厚得近乎一个农村生产队长，一笑，两眼眯成一条线。老李介绍道：“这是木青，这位是——王鸿谟！”

我这口粥差点没咽下去，慌忙站起给王鸿谟行了个礼。王鸿谟双手拉住我手。眯眼笑道：“我们早就认识了，在稿子上和信上认识的。”

我连连点头称是。

王鸿谟又瞅瞅李景峰道：“你知道他吗？小说北组副组长，吉林大学高才生，你们东北人！”

李景峰笑道：“在外见老乡，两眼泪汪汪。”

“还有组长王笠耘同志，回头会来看你。”王鸿谟补充说。

我说什么呢？只有受宠若惊地点头。此外，多少还有一丝担心：可别搞错了对象？我是文艺黑线人物木青。

我住在了“人文”社后院新盖的作家宿舍，二楼一号。据说，新楼盖成后，第一个住进这房间是写过《达姬和她的父亲》、《云崖初暖》的四川作家高缨，此后便一直锁着，人称零号房间。

招待所陆陆续续地住进一些作家，一下子热闹起来。

我为了专心写作，便躲在屋里，还把门插上了。

突然，门被“嘭”地踹响，像打雷，惊天动地。我大惊失色，误为红卫兵驾临。忙打开门。“哈哈哈哈哈！”边傻笑边进来个胖乎乎的戴眼镜小伙儿，抱着一卷儿信报，“嚓嚓”踢踏着两只穿布鞋的大脚：“你是新来的吧？啊？”

我不知对方何许人，毕恭毕敬：“是是，你是……”

“哈哈，我你还不知道？……有吃的吗？”说着，拉开抽屉翻。

我正疑惑加不快之间，黑龙江省作家刘亚舟及时赶到，在我耳边小声说：“这是个傻子，他爹妈‘文革’挨斗吓的。”我大悟，方才解除“警报”。从此，逢听到走廊有“嚓嚓”走路声及别处“嘭嘭”踢门声，便立刻跳将起来去开门。有时，还要准备点吃的，哪怕一块糖。

继后两三天，时而社领导来看我，时而编辑带我去看社领导，他们，几乎全是文坛赫赫有名的人物：韦君宜、严文井、屠岸、孟伟哉……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自己融在了作家的氛围里。

然而，后来的严酷现实告诉我，这里，也并非是一块安静的绿洲。

我去那会儿，“四人帮”晚期的“追查谣言风”自然已经过去，不过这种“过去”，也似乎太近太近，宛如昨日。何况“四人帮”的追随者，“上当受骗者”，还仍活跃于社里！我们许多人的心灵上仍感某种无形压力。然而这时，一个不脛而走的“故事”竟是那样强烈地吸引着人们：一个并不年轻，水平也并不高的编辑（恕我用这种隐匿的手法写），在“追查谣言”的高潮时，不知是出于何种目的，反正他是那样积极主动地向驻社军宣队，什么“追查谣言办”检举揭

发了自己的作者——刚从长期监禁中解脱的作家沈凯，说他跟自己讲了什么什么，这是属于什么什么性质的问题……沈凯是北京电影学院早期编剧班学员，在文艺界，特别是电影界，颇有几位熟人，听些谣传，出于新鲜和对责编的友情，说了，传了，这恐怕不会是假的。问题是这位责编大人可真下得去手，竟对这样一个因被长期监禁批斗而变得唯唯诺诺，谨小慎微，眼睛都几近熬瞎的弱者开枪！人间正道毕竟是正义，这事传出后，小说北组的副组长李景峰立刻炸了，王鸿漠等几乎所有编辑都炸了；“太不像话了，你就这么跟作者交朋友！我们对这些可怜的作者保护还保护不过来呢，怎么还能这样……”“你可真能耐，告了自己的作者……”这种当面背后的谴责，一直延续到我入社那会儿。这是正义的声音！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正风！

后来，这位做了错事的编辑，自觉无脸，再加水平不行，主动要求调离了。

我听了这“故事”，无比感动和欣慰。

与我所住房间仅隔两个门的冯骥才，以鹤立鸡群的个子，健谈、文思敏捷而著称，由于他写过《义和拳》，加上长相与善谈外国作品——有时还给你背上一段，惊呆四座（谁知是真背还是信口唬人），反正人们因此给他起个雅号：八国联军的后裔。白天，且不说他起来很晚，纵然起来，也是一边刷牙，滴着白沫子，一边跟别人东拉西扯。从这会儿起，他这活跃的一天便宣告开始：打几下篮球、串屋、串办公室、说话，显示自己的力量……然而，他竟然在自己的房间门口挂起了“免战牌”——“谢绝一切谈话”。可想而知，这种“免战牌”会起到怎样的反响和逆反心理：啊，你是只到别人屋里搅和，不许别人到你屋去，没门儿，偏去！这

下，连那本来很少到他屋的人，这会儿也兴冲冲去了。其实，人们早已发现，大冯的特点是晚上写作，时常一搞就是通宵。可我们这些人不行啊，毕竟跟八国联军没关系呀，一旦晚上不睡，第二天头昏脑涨，这叫民族传统。尽管如此说，我还是愿和大冯说话，我欣赏他的机敏与聪明过人。除我之外，还有一个人，即王群生。我俩常让大冯再背一段外国名著，虽然我俩有的也读过，可谁能记得住呀。不管他真背还是假背，即或是唬，我们也心甘情愿。

不知不觉间，我与大冯成了朋友，可是我们的个头太不相称，有人管我们叫堂·吉诃德和礼拜五。我想，我们的接近，大抵与彼此在“文革”中有共同遭遇有关。一回，我们顶着冷风，去天安门广场观看为纪念周总理逝世，也为纪念“四·五”运动而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摆放的白花的海洋。我们在人流与白花间行走，深沉地看着一位年轻母亲，将怀中娃娃放下，让娃娃捧着自做的很小很小的也就饭碗大的花圈，放在那高高大大，几乎有二层楼高的大花圈中间。我蹲下，看那小小缎带上的字：“周爷爷，我亲你！”见此情形，我流了相，大冯拍了一下我的肩膀，也异常难过地垂下头。

这是继“四·五”运动后，又一次大型的自发性的纪念活动，秩序井然，宁静、悲痛。

这期间，《人民文学》发表了刘心武的短篇《班主任》。它意外地在“人文”社的编辑、作者中引起了热烈的讨论。

在我印象里，在这众多讨论的人中，只有一个人，对这小说全面否定，他即是住在我隔壁，为改不出作品苦恼万端的G某。他看后，一言以蔽之：“这是一篇彻头彻尾的毒草！”

当他第一次把这观点到我屋亮出后，我大惊，还是有点

紧张。我试探地问他：“毒在哪儿？”

他那本来就黑的脸，突然变成猪肝色：“把正面形象写成了什么？打小报告有什么不对！……”

噢，原来如此。凭我一贯的火暴脾气，跟他争吵起来，但这次，却意外马上就平静下来，一为赶紧改出稿子，和为贵，忍为高；二为可怜这位“文革”中培养出来的作者，硬是耐着性子，自不量力地用我“文革”前十四年编辑经验，跟他掰着手指头讲文学创作，塑造人物，艺术追求之类的基本知识，力图说服他，改变对《班主任》的不正确看法，我太天真了！

那些天，我发现他情绪十分不好，常常一天一天不跟别人说话，连饭也不到食堂吃，去吃，也躲在角落里。有时，还一个人到外散步，显得特别的冷清，孤僻。作者们私下议论：“G某怎么啦，好像在跟谁怄气！”

一天，王鸿谟同志突然找我，小声关切地说：“你以后和冯骥才说话注意点，有人向军宣队报告，说你们俩私下议论，反党反毛主席！”

我大惊。我来“人文”改稿本来就够谨慎小心了，怎么还惹出这种可怕的事来。我到底惹谁了？又跟大冯说什么了？莫名其妙嘛。我仔细回想，只有那次和大冯去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看花圈回来，谈了些“文革”当中的事，如烈士张志新对毛主席某些做法不满，怀疑可能因年老糊涂了等等。老实说，这些话与那些过激言语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可为何偏偏找我们的茬儿？记得当时在场的还有王群生，怎么没有点他的名？柿子拣软的捏？我痛苦又气愤，还有点怕，怕因此赶我走。我问：“这是谁打的小报告？”

王鸿谟见我急得不行，便实说了：G某。

不怪这位 G 某那么讨厌《班主任》，原来他本人就是个打小报告者！但我不解，我并没惹过他呀？他干吗害我和大冯？

我当然把这事告诉给了大冯。

大冯在二楼拐角处的厕所门口，追到了 G 某，笑呵呵地一把攥住 G 某的手腕子，只一抡，从上到下划个弧线，G 某就叫了起来，连连揉手腕子，原来手腕子被大冯攥紫了，破了。“你这是干什么？”G 某扬脸怒问。“跟你闹着玩呀！”大冯答，“谁知你这么不禁攥。”

大冯学过武术，谁抗得了这么玩儿。

只是，我这弱者干吃哑巴亏，顶多，不再跟 G 某说话了。悔不该当初跟他争论《班主任》。

由此，我比以往更加踮着脚走路，“文革”的教训证明，谣言不仅能害人，也能杀人！上哪儿说理去？纵然有朝一日说了理，又能怎样？可你的好事被耽搁了！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啊，严霜单打独根草。

出于同样的翻身欲，我在来京前，还分别给一些刊物写了短篇、散文、诗之类，一句话，十八般武艺，哪个会使都不放弃。结果，这时纷纷发出。于是乎，引来些约稿者，这其中就有 D 出版社两位女编辑。由于谈稿误了返回的时间，而现出去找招待所又十分不便，无奈，我和“人文”负责“作家宿舍”的管理员说了一声，让她俩住我房间（正好我屋还有一张空床），我到另一房间找宿。按说，这事已四脚落地，万无一失。然而，事情偏偏从这儿出来。事后第二天，又传出我和两位女编辑同住一室的谣言。迫其根源除那位住在隔壁的少言寡语的孤僻者外，还外加一个 H 省来的

作者，同样是“文革遗产”。我向别人苦笑：“此事，有两方面给我作证：一是管理员；二是我借宿那屋的作者。”大伙哈哈大笑。

这事，连同上次和大冯那起事件，都不消自灭。但我深知，这是捡了政治气候好转的便宜，不然，就单凭这两件谣言，也弄我个半死，不清不白。

这事不久，“文革遗产”均因多年改不出来，内容又无法适应截然相反的今天，故而谢辞了，其中也包括 G 某。他们这一走，作家宿舍中弥漫的阶级斗争气味明显减少了。我长出一口气。

不过须说明，我看过 G 某的一些作品，写得还是不错的，满有生活气息，与那些“文革遗产”不能等同看待，只是他太“凡是”了。

后来得知，他进了“文革”后中国作协第一届文学讲习所（现在改为鲁迅文学院）学习，其间，作风不改，甚至当教师依着“三中全会”文件精神评价毛泽东时，他也挺胸拔腿退出课堂，以示抗议，至于同学间有关这方面的争论，他总是歇斯底里大发作乃至破口大骂。并且，事后气不消，抑郁、痛苦。常因此不吃饭，手托后脑勺躺床上憋气，实在“凡是”得可爱。

前年春，我去哈尔滨，黑龙江作协副主席程树榛和作家刘亚舟二兄告诉我说：“听说了吗？G 某死了！”

我吃一惊：“怎么死的？”

“肝癌！这回你……”

我估计他们要说“高兴”与“解气”之类的话，忙制止：“不，我很难受。若把人分成好坏人的话，他还属好人，只是‘四人帮’那套东西给他灌得太多了。”

我们三人共同认为，G某患这绝症，与他长期抑郁寡欢有关。是极左路线的受害者。

细想，他可怜又可悲。

回过头再说，这事传出后，那个叫责编“卖”了的沈凯，这会儿，为“远离尘世”，对纷繁复杂的现实敬而远之，保持距离，集中精力写作，还搬到北京西山八大处住去了。这地方，据说曾是中国作协的“写作之家”，“文革”前，田汉等大家都曾来过。如今，这里和其他名胜古迹一样，早已破败得可怕，只为不让这片房子被人扒倒，园林管理部门才花钱顾了个老人看着。“人文”社有意买下这房子，给作者改稿用，只派个炊事员、管理员就成了。但后来不知为什么，此事告吹了。却说我们的“不幸”传到沈凯耳朵里后，他特意从八大处赶来，对我安抚。

说到西山八大处那地方，他说仿佛一下子跳出闹市，来到一个野得可爱、静得出奇的所在。也许正因为如此，这儿，出现了两种极端：一个是白天有些现代纨绔子弟，穿着时髦的衣裳，带着吃食，携男挎女来到后山坡的草丛里，狂跳狂唱，狂欢狂闹之后，便开始另一阵更为不堪入目的鬼混……还有一个是静得如入幻境，听说“文革”前，某某作家在这儿写作，写至午夜过后，猛抬头。见后山坡上站着一个女人，正朝他窗户望。他模糊觉得有点眼熟，再细看，竟是他的老嫂子。他不顾一切地推门想去叫：嫂子，你干吗在这儿站着，什么时候从老家来的？然而，转眼间嫂子没影了。后山坡依然静得连风声都没有，在月光和星光的辉映下，整个儿空间一片青蓝颜色……第二天，他接到老家电报：嫂子已于昨夜去世了。

我想，这类故事，只有在荒无人烟的山野才能发生。